

## (一) 列寧的革命前設想和蘇俄的早期實踐

列寧 (Vladimir I. Lenin, 1870 ~ 1924) 的社會主義模式既繼承了馬克思的理論，又有自己的特點。它的最大特點，是引入掌握強制力量的國家機器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組織者。這與「社會大工廠」和「自由人聯合體」大為不同。列寧在他寫於十月革命前夕的著作《國家與革命》中，把社會主義經濟比擬為一家「國家辛迪加」(The State Syndicate)，即一家由國家壟斷經營的大公司。他說，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裡，「全體公民都變成了國家(武裝工人)的職員，全體公民都成了一個全民的、國家的『辛迪加』的職員和工人」，「整個社會將成為一個管理處，成為一個勞動平等、報酬平等的工廠。」<sup>①</sup>

國家機器的引入，使馬克思主義關於公有制的學說發生了變形。

列寧和他的後繼者把國家的作用提升到極高的地位，把國家所有制看作社會主義的唯一經濟基礎。

國家機器的引入，使馬克思主義關於公有制的學說發生了變形。在列寧以前，馬克思主義者對「國家迷信」嗤之以鼻。他們認為「國家再多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因此主張要創造條件使得「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sup>②</sup>恩格斯說，「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餘的事情

<sup>①</sup> 《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2頁。

<sup>②</sup> 恩格斯(1891)：《馬克思〈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6頁。

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sup>①</sup>列寧和他的後繼者把國家的作用提升到極高的地位，把國家所有制看作社會主義的唯一經濟基礎。

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取得政權以後，俄共領導層內部對於在小農經濟仍然占統治地位的俄國能否馬上使國家所有制成為唯一的經濟基礎有不同意見，列寧本人也多少有一些舉棋不定。在1918年5月所寫的《論「左派」幼稚病和小資產階級性》<sup>②</sup>一文中，他提出了經過一個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歷史階段逐漸向以國有制為基礎的「完全的社會主義」過渡的考慮。

可是，外國干涉和國內戰爭的爆發促成了實行全面國有化和轉入命令經濟的決定。對經濟實行全面的行政管制和配給制度本來是一種戰時緊急狀態下的必要舉措，而當時的俄共領導人卻把實行這種轉變看作是社會主義理想的實現。於是，蘇俄就以「戰時共產主義」這樣一種特殊的形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計劃經濟模式。

「戰時共產主義」體制，是列寧在1917年提出的「國家辛迪加模式」在嚴峻的戰時形勢下的漫畫式的變形。

可是，1919年俄共八大通過的黨綱卻把這種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的標準經濟體制寫入了俄共黨綱，

「戰時共產主義」是世界上第一個計劃經濟模式。其特徵是：全面的行政管制和配給制度。

以致當時俄共兩位最著名的理論家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1888～1938）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Evgennii A. Preobrazhenskii，1886～1937）為解釋俄共黨綱所寫的宣傳小冊子《共產主義ABC》<sup>③</sup>把戰時共產主義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典型。

<sup>①</sup> 恩格斯（1878）：《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1頁。

<sup>②</sup> 《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0～540頁。

<sup>③</sup> 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1919）：《共產主義ABC》，北京：三聯書店，1982年。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這本小冊子得到列寧的很高評價，並且在中國的老一代革命家中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鄧小平（1904～1997）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講到，「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是形式主義的，辦不到」時指出：「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見鄧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頁。）



### 蘇聯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模式

1919年3月，俄共（布）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奪取政權以後的第一個新黨綱。新黨綱為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設計了第一個實踐性的原則框架，並由俄共理論家在《共產主義ABC》（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合著）、《過渡時期經濟學》<sup>①</sup>（布哈林著）等書中對其做了權威的解釋。

他們認為，資本的積聚和集中傾向的「數學界限」是使整個國民經濟轉變成一個「絕對統一的聯合托拉斯」，而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首先就要剝奪大資本，實現國有化。然後，要根據一個總的國家計劃把所有的經濟活動統一起來，由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及其下屬各級工業局層層管理。同時消滅商品市場，使貨幣變為計算單位，實行國家範圍內的有組織的生產。

在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要使小農經濟轉變到「社會主義大經濟」，具體的辦法就是興辦國營農場、城市農業。在農村，則要把眾多的「小經濟」聯合起來，其具體的形式就是公社和勞動組合。公社不僅是農民在勞動方面的聯合組織，也是他們在分配和生活方面最緊密的聯合組織。在產品分配方面，主要是要所有的居民都參加消費合作社。所有的消費合作社都實行社員自治。此外，蘇維埃政權還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分配機構，對糧食、住宅等重要的消費資源進行統一分配。

銀行也要實現國有化和統一化，它是生產的統計機構和財政分配機構，它的所有業務都要由國家壟斷。社會主義社會最終要消滅銀行，把它變成社會的總會計處。同樣，貨幣也要逐步退出流通。首先在國有化企業內部的產品交換領域內取消貨幣，然後在國家同國家工作者之間的結算領域內取消，下一步在國家和小生產者之間以商品交換取代貨幣，再一步是在小經濟內部取消，最後使小經濟和貨幣一起消滅。

根據布哈林、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共產主義ABC》和布哈林的《過渡時期經濟學》編寫。

① 布哈林（1920）：《過渡時期經濟學》，北京：三聯書店，1981年。

嚴格的軍事紀律和配給制度幫助俄國共產黨人保住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在國內戰爭結束以後，廣大民眾尤其感到不能忍受。在國內不滿日益加劇的情況下，列寧認識到，「直接用無產階級國家下法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裡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和分配」的做法是錯誤的<sup>④</sup>，需要重新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途徑。於是，蘇俄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其主要內容是恢復「商品交換」，發展「適應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商業」，並在一切工商企業中實行「商業化原則」和「商業核算」。這樣，蘇聯實行的「新經濟政策」在社會主義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條件下，「轉而採取市場的經濟形式」，恢復市場制度<sup>⑤</sup>。

列寧在醞釀採取新經濟政策時曾堅持認為，「周轉自由就是貿易自由，而貿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資本主義去」，「真正的計劃」必然是「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然而，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卻使列

寧的想法發生了變化。1921年他在紀念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演講中指出，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統一的

新經濟政策意味著在國家控制經濟命脈的條件下恢復市場制度。

國家計劃同計劃經濟並不矛盾。他說：「新經濟政策並不是要改變統一的國家計劃，不是要超過這個計劃的範圍，而是要改變實現這個計劃的辦法。」<sup>⑥</sup>這就是說，他認為在當時的條件下，蘇維埃國家可以以市場為基礎，加上政府的計劃協調，實現國民經濟的「計劃性」，即按比例的發展。

## (二) 史達林體制的建立

1924年，蘇聯的工農業生產大體得到恢復，列寧也於同年去世。蘇共內部對新經濟政策的發展前景形成了兩種對立的看法，在領導層中就新經濟政策的存廢問

④《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571頁。

⑤1922年4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關於工業的決議》指出：「既然我們已經轉而採取市場的經濟形式，就一定要給各個企業在市場上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總管理委員會的行政手段已經為機動靈活的經濟手段所代替。」（見《蘇共決議草編》第2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59～261頁。）

⑥列寧（1921）：《致格·馬·科爾日扎諾夫斯基》，《列寧全集》第5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0頁。

題進行了一輪新的論戰。

論戰的導火線是蘇聯工業化的方法和速度問題，但它的實質卻在於蘇聯應當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和市場經濟，還是應當建立行政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爭論中，蘇共領導分成三個政治派別，他們分別是以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879～1940）為首的「左派」、以布哈林為首的「右派」和史達林（Josef Stalin，1879～1953）為首的「中派」。

蘇聯國內圍繞著工業化問題發生的這兩次論戰，從理論方法上來講，被稱為「發生學」（embryology）與「目的論」（teleology）之間的論戰。持「發生學」觀點的布哈林在這兩次論戰中遵循的邏輯是，從現實的經濟情況出發來規劃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進程。他說：「農民的實際需求越大，我們的工業就會發展得越快。隨著農民經濟積累速度的加快，我們工業的積累速度也會更快。」而為了與農民聯盟，就必須實行「新經濟政策」和保留市場制度。持「目的論」觀點的一方，則主張按照加快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要求主觀地規定經濟發展的方向和計劃。正如當時爭論的參與者之一、「目的論」者費爾德曼（Grigorii A. Fel'dman）所說：「無產階級成了生產的主體，可以在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之間任意分配自己的力量。」「目的論」實際上把體現政府意志的國家計劃和客觀經濟規律混為一談，從而為實行強制集體化和建立史達林主義經濟模式奠定了理論基礎。

在上述兩場黨內鬥爭中先後擊敗了「左派」和「右派」的史達林隨後採取了較之「左派」更「左」的方針，批判「迷信市場自發力量」的「右傾機會主義」，否定了新經濟政策。在「反右」的基礎上，史達林在1929年掀起了強制集體化運動，建立起集中計劃經濟體制。

史達林把無產階級專政的行政強制力量發揮到了極致，使列寧的「國家辛迪加」由一種理論模式變成了現實。史達林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國有制＋計劃經濟」的公式統治了社會主義國家半個多世紀。在史達林的親自指導下，由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寫作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以下簡稱《教科書》），把國家所有制和由國家機關組織實施的計劃經濟列為社會主義最基本的經濟特徵。其中，國家所有制更被看作是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雖然史達林的社會主義定義帶有明顯的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強烈批評過

的「國家迷信」的色彩，但是它在相當長的時期中仍被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視為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

許多研究蘇聯問題的「蘇聯學」專家往往把蘇聯直接依靠國家強制力量進行強制集體化和建立高度集權的行政社會主義完全歸因於史達林粗暴的性格特徵。看來這種分析是把問題簡單化了。史達林所建立的行政社會主義的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和列寧的「國家辛迪加模式」並沒有原則的不同，而充分運用國家的強制力量來推行國家的發展計劃，實現國家目標，乃是俄羅斯從彼得大帝（Peter I, the Great, 1672～1725）以來的傳統。既然蘇聯確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其實是軍事工業）的工業化路線，在經濟基礎還很薄弱的條件下實行超高速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無法通過市場用輕工業品去交換農民的糧食和農產品原料並創造積累，建立這樣一套命令經濟體制，以便使用強制的方法徵集農產品和從農民那裡取得，「貢賦」乃是一種必然的結果。<sup>②</sup>

史達林對列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也作了一些變動，就是在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2）的執行遇到麻煩的情況下，羞羞答答地把市場因素（價值規律）的作用以「經濟核算制」的形式引入自己的模式<sup>③</sup>。後來他又進一步承認，「由於兩種公有制形式長期並存，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仍然是必要的東西」<sup>④</sup>。不過所有這些都只是局部修補，並不涉及以國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的基本框架。

史達林模式在蘇聯被奉為圭臬，並被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所仿效，於是史達林的觀點長時期被視為社會主義標準理論。

<sup>②</sup> 史達林認為，布哈林的主要錯誤，「是他在城鄉之間的『剪刀差』問題即所謂『貢賦』問題上對黨的路線進行了機會主義的歪曲。」史達林強調，農民除了向國家繳納普通稅款之外，還應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繳納一筆超額稅。這筆超額稅是「為了推進工業的發展，消除我國的落後狀態」而繳納的。（見史達林（1929）：《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史達林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8～149頁。）

<sup>③</sup> 史達林1931年6月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中強烈批評了蘇聯經濟中種種「平均主義」的做法，提出了要規定差別工資，刺激工人上進，並在國營企業中實行經濟核算制。（見《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任務》，《史達林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6～297頁。）

<sup>④</sup> 史達林（1952）：《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史達林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78～582頁。

###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特徵

蘇聯於1954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在史達林的親自指導下由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撰出版的。

《教科書》認為，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是一套以兩種形式的——國家的（全民的）和合作社集體農民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有計劃的，其目的是用不斷提高生產的辦法來最充分地滿足勞動者日益增長的需要，而且實現著按勞分配的原則。

《教科書》突出了國家所有制的支配地位。它認為，「國家所有制是高級的最發達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它體現著「最成熟、最徹底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著主導的和決定的作用」。

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發展前景，是向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單一國有制）過渡。

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它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一切主要過程，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和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是社會主義的另一項重要經濟規律。它要求用計劃來指導經濟，對國民經濟進行計劃指導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組織職能的最重要的特徵。

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流通僅限於個人消費品。勞動力不是商品，因此，工資不是勞動力的價格。社會主義的貨幣是計劃國民經濟、計算和監督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工具。在商品流通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國營和合作社形式的市場，其價格是有計劃地規定的。

根據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1954）：《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北京：三聯書店，1959年）編寫。

蘇聯在戰前時期和戰後恢復時期的確保持了較之資本主義各國高得多的增長率。據美國經濟學家伯格森（Abram Bergson）估計，1928～1955年蘇聯國民收入的年均增長率為4.4%～6.3%。1929～1932年的「一五」計劃期間蘇聯工業年增長率達19.2%，1933～1937年「二五」期間為17.8%，1938～1940年的「三五」期間為13.2%。1950年，蘇聯社會總產值比1913年增加17.2倍，其中工業產值增加了12倍，工業中生產資料產值增加高達26倍，社會國民收入總額也增加了7.8倍<sup>⑥</sup>。計劃經濟體制對蘇聯的工業化和做好反法西斯主義戰爭準備有一定的貢獻，但蘇聯也為此付出了物質和生命的沉重代價。

早在50年代，集中計劃體制模式的缺點就開始顯露。進入60年代以後，蘇聯、東歐國家增長率逐年降低，效率下降、技術進步放慢，同資本主義經濟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這種惡化的趨勢日益加強。於是，改革原有經濟體制的問題被提了出來。

### （一）蘇聯改善經濟的努力及其失敗

史達林逝世以後，蘇共領導人亟思使蘇聯經濟有所進步。赫魯雪夫（Nikita Sergeevich Khrushchev，1894～1971）在1957年進行了以向地方政府放權為特徵的「地區國民經濟委員會」（Sovnarkhoz）改革。這次改革的目的是把國民經濟的中央和部門行政管理改為地區行政管理。採取的主要措施是撤銷25個聯盟共和國部，113個加盟共和國部，把它們的職能由新成立的105個經濟行政區委員會行使；將本來隸屬於聯盟和加盟共和國的企業下放給地方，中央管轄的工業產值由45%降至6%；計劃物資也由以中央平衡為基礎改為以地區平衡為基礎。這樣做的結果，不但經濟體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用行政命令配置資源的固有弊端沒有能克服，而且由於打亂了原有的經濟聯繫格局，加劇了地方分割而使經濟出現了混亂。赫魯雪夫分權改革的失敗促成了1964年蘇聯領導層的「宮廷政變」和赫魯雪夫的下臺。

柯西金（Aleksei Nikolaevich Kosygin，1904～1980）繼赫魯雪夫擔任總理以後，恢復了以「條條」為主線的集權管理體制。接著，1965年在柯西金的領導

<sup>⑥</sup> Bergson, A. (1961): *The Real National Income of Soviet Russia Since 19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下，進行了以放鬆計劃控制、擴大企業自主權和實行「完全經濟核算制」為主要內容的改革。這一改革在取得短暫的增產增收效果以後，由於激勵效應衰減和財政情況惡化而使蘇聯經濟陷入衰退，因而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停止了這種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

在柯西金改革失敗以後，蘇聯領導人不再試圖改革蘇聯的經濟體制，而是企圖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作某些改良。當時採取的主要措施是：

1. 實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自從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蘇聯的經濟增長率一直遠遠高於西方各主要國家。但是，為什麼蘇聯經濟卻又落後於西方經濟呢？經過研究，經濟學家得出的結論是：問題出在「增長方式」上。這就是說，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主要是靠外延增長，也就是不計成本，靠大量增加要素投入，特別是資本投入取得的。因此增長率雖高，卻沒有多少實惠；而且由於資源是有限的，隨著資源日漸緊缺，這種很少實惠的高速度增長也很難維持下去。為了克服這種缺陷，蘇聯經濟學家提出應當實現「由外延增長方式向內涵增長方式的轉變」。蘇共領導接受了這種意見，把發展科學、增強研究開發（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工作、加快技改引進和企業的更新改造確定為第九個五年計劃（1971～1975）的重點，並要求在這個五年計劃中實現「由粗放增長方式到集約增長方式的轉變」。由於沒有抓住要領，他們忽略了外延增長方式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這個最重要的事實，把問題的重點放在技術問題上，企圖用行政命令和大量投資「加快技術進步」，在體制方面只做一些小的修改。這樣，正如圖表1-2所顯示的，蘇聯經濟的勞動生產率雖然有所提高，資本生產率卻大大下降了。因此直到蘇聯解體，蘇聯經濟也沒有達到主要靠提高效率（內涵增長）實現高速增長的要求，相反，全要素生產率逐年下降。
2. 計劃工作的「科學化」。蘇聯改善計劃經濟的另一項舉措，是企圖運用現代計算和資訊技術來提高計劃決策的科學性，加強和改善計劃管理。直到戈巴契夫於1985年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蘇共領導都堅持「計劃化過去是、現在仍然是管理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槓桿」<sup>④</sup>；同時他們也允諾改進計劃方法。應當

<sup>④</sup> 本節主要取材於A·V·巴楚林（1977）：《計劃經濟管理方法》，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

圖表 1-1 蘇聯經濟的年均增長率 (%)

|                | 1951~1960 | 1961~1965 | 1966~1970 | 1971~1975 | 1976~1980 | 1981~1985 |
|----------------|-----------|-----------|-----------|-----------|-----------|-----------|
| 蘇聯官方統計         | 10.1      | 6.5       | 7.8       | 5.7       | 4.3       | 3.6       |
| 美國中央情報局<br>的估計 | 5.6       | 4.9       | 5.1       | 3.0       | 2.3       | 0.6       |
| 蘇聯學者的估計        | 7.2       | 4.4       | 4.1       | 3.2       | 1.0       | 0.6       |

■ 資料來源：Hewett, E.A.(1988): *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 (《改革蘇聯經濟》),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pp.37-59。

圖表 1-2 蘇聯生產率變化趨勢 (%)

|           | 1961~1965 | 1966~1970 | 1971~1975 | 1976~1980 | 1981~1984 |
|-----------|-----------|-----------|-----------|-----------|-----------|
| 全要素生產率    | 0.5       | 1.2       | -0.5      | -0.9      | -0.3      |
| 其中：勞動生產率  | 3.4       | 3.2       | 2.0       | 1.5       | 1.9       |
| 資本生產率     | -3.5      | -2.0      | -4.0      | -4.0      | -3.4      |
| 土地生產率     | 4.4       | 5.6       | 2.9       | 2.7       | 2.8       |
| 外延增長/內涵增長 | 0.10      | 0.23      | -0.14     | -0.35     | -0.11     |

■ 資料來源：Hewett，同前書，第74頁。

說，蘇聯計劃機關在運用現代技術方面的水平是不低的。它們早就不限於用實物平衡表來編制計劃，而是廣泛運用了各種數學模型。從1969年起，根據蘇聯計劃委員會的決定，在計劃工作中採用了包括原材料消耗定額、材料儲備定額、設計能力運用定額、設備儲備定額在內的完備的定額體系，加強對企業經濟活動的定額管理。從1976年開始的第十個五年計劃期間，又增加了對勞動消耗、工資、資金及其利用等定額的管理，還採用了國家計委和各科研機構共同制定的社會生產經濟效率計劃指標體系。特別重要的是，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決定在已有的國家計算中心網和全國統一的自動化通訊網的基礎上建立「自動化計劃計算系統」。他們認為，依靠這一系統，運用經濟數學方法、程序

以及組織技術和通訊工具來編制計劃，就能使計劃趨於完善。這個由蘇聯國家計委領導、140多個科研機構和設計機構參加建立的系統，其第一期工程在1976年交付使用，第二期工程也在1980年交付使用<sup>⑩</sup>。至此，蘇聯計劃編制程序從技術上說已經盡善盡美，但是由於計劃經濟制度本質性的缺陷，蘇聯經濟從70年代初開始進入長達15年的「停滯時期」。

蘇聯經濟的不良績效，不僅表現為增長率的持續下降，更重要的是表現為效率的持續下降。根據蘇聯學者阿甘別疆的計算，1961～1984年期間，蘇聯的全要素生產率（TFP）除柯西金改革階段獲得提高1.2%的較好成績以外，一直在-0.9%～0.5%之間徘徊<sup>⑪</sup>。

戈巴契夫（Mikhail S. Gorbachev，1931～）在1985年上臺後，採取的第一項重振經濟和收拾人心的措施，是提出所謂的「加速戰略」。可是回避改革、謀求「加速」的實際結果是，經濟發展非但沒有加速，反倒使經濟增長率下降到零。這種情況迫使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於1987年提出「改革」，但對改革的目標是什麼以及如何改，一直沒有說清楚。直到1989年中期以後，才明確了要向某種市場經濟體制過渡，但此時蘇聯領導對大局已經失去控制，領導人陷於政治上的鬥爭，雖然制定了一個又一個改革「計劃」、「方案」和「綱領」，經濟體制基本上原封未動，而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則一步步滑入深淵，導致了最後的劇烈波動和蘇維埃政權的崩潰。

## （二）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改革

1948年，蘇聯集團的國際組織共產黨情報局將南斯拉夫共產黨開除出蘇聯集團。在極端孤立的情況下，南斯拉夫領導為了尋求群眾支援，在50年代初期首先打破了史達林模式，走上了獨立發展「自治社會主義」的道路。

<sup>⑩</sup> 金揮、陸南泉、張康琴主編：《論蘇聯經濟：管理體制與主要政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年。

<sup>⑪</sup> 轉引自Hewett, E. A. (1988): *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 (《改革蘇聯經濟》),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pp. 69-70。

黨政領導幹部絕不可以「四面出擊」，「樹敵過多」<sup>④</sup>。

從1949年到1952年，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按照「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然後才可以採取步驟進入社會主義的設想部署工作<sup>⑤</sup>。甚至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時，有的民主人士建議文件中要提到社會主義，共產黨的領導人也沒有接受這個意見。

到了1952年，當土地改革和

朝鮮戰爭都已結束時，行動方針  
發生了重大變化。1952年6月6

1952年毛澤東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由此開始  
了向社會主義的急速過渡。

日毛澤東在對中共中央統戰部的

一份文件批示中重提「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並且指出「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sup>⑥</sup>。9月24日他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一次會議上提出：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後才開始過渡。1953年11月他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上說：要消滅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工商業<sup>⑦</sup>。1953年6月1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同時批評了劉少奇「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方針，說那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sup>⑧</sup>。

<sup>④</sup> 毛澤東（1950年6月）：《不要四面出擊》，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1～24頁。和中共其他領導人不同的是，毛澤東的這個指示只是策略性的。他在後來追溯當時的情況時說道：「1950年，我在三中全會上說過，不要四面出擊。那時農民還沒有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面來，如果就向資產階級開火，這是不行的。」後來實行土地改革，特別是把農民組織到農業生產合作社裡來，「這就會使資產階級最後地孤立起來，便於最後消滅資本主義。在這種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參見毛澤東（1955年10月）：《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見毛澤東同上書，第196頁。

<sup>⑤</sup> 1951年5～7月，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先後向中共黨內高級幹部全面闡述了「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指導思想。見劉少奇：《「三年準備、十年建設」》、《春藕齋談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178～210頁。）

<sup>⑥</sup> 毛澤東（1952年6月）：《現階段國內的主要矛盾》，《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1頁。

<sup>⑦</sup> 毛澤東改變原來觀點和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過程，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64～65、213～230頁。

1953年8月，過渡時期總路線被正式確立為全黨都必須遵循的路線：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這條總路線，應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了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sup>55</sup>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指出，「這條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們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sup>56</sup>。

1953年10月15日，毛澤東在與陳伯達、廖魯言談話時，點明總路線的要旨在於「解決所有制的問題」：擴大國有制，將私人所有制改變為集體所有制和國有制，「這樣才能提高生產力，完成國家工業化」<sup>57</sup>。

接著毛澤東在1955年組織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這次運動以批判當時農村工作的主要領導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開路，繼之以動員農民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運動。只用了大約一年的時間便廢除了農民家庭農場制度，實現了合作化。接著發動「併大社」，1958年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個體農民的消失，使私人工商業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sup>58</sup>。毛澤東在1955年10月召開全國工商聯執委會成員座談私營工商業的改造，號召工商業者「準備共

<sup>55</sup> 毛澤東（1953年6月）：《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1～82頁；毛澤東（1953年6月）：《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提綱》，見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251頁。

<sup>56</sup> 毛澤東（1953年8月）：《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同上書，第89頁。

<sup>57</sup> 中共中央宣傳部（1953年12月）：《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見《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彙編》（第1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41～374頁。

<sup>58</sup> 毛澤東（1953年10～11月）：《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8～301頁。

<sup>59</sup> 「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割斷了農民同市場的聯繫。」「到1954年底，全國公私合營工業的戶數有1,700多戶……這時，實行公私合營的主要是大中型企業，剩下來的中小型和比較落後的中型企業處境困難。……與國營、公私合營企業劇烈競爭的企業確實難以生存了。因此，他們願意實行全行業的公私合營。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資本主義工商業也掀起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高潮。」（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8～222頁。）

產」，即實現國有化<sup>⑩</sup>。在這樣的環境下，工商業資本家紛紛提出申請，要求國家用「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形式對自己實行「社會主義改造」。

這樣，從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計劃用15年甚至更長一點時間實現的對個體農業和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結果僅僅用了不到3年的時間便實現了公有制成為國民經濟的惟一基礎的目標。在這一所有制基礎上，全面建立了蘇聯式的集中計劃經濟體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急速地由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對於毛澤東而言，是早在建國以前就已經有所謀劃的，而對於多數人，包括一些黨的高級幹部來說，卻是沒有思想準備的。它之所以能夠在短短的一、兩年中順利實現，其主要原因是：

1. 仿效蘇聯的榜樣，廢除市場制度，建立以高度集中的行政協調為特徵的計劃經濟，曾經在很長時期中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天經地義。新中國成立後，「蘇聯專家」以史達林的政治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學教育進行了全面改造，成為惟一通行的經濟學理論。按照這種理論，建立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則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2. 朝鮮戰爭爆發以後，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加強國防力量被提到日程的首位。為此，中國領導人選擇了有利於集中動員和配置資源的制度安排，以便把有限的資源運用到以軍事工業為核心的重化工業中去。
3. 承受過一百年殖民地、半殖民地屈辱，黨政領導人和普通民眾普遍懷有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的強烈願望，認為仿效蘇聯的榜樣，依靠已經取得的國家權力，充分動員和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財力，中國將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
4. 中國長時期是一個小農充斥的國家，「行政權力支配社會」形成牢固的歷史傳統。解放以後，毛澤東依靠自己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崇高威望，建立了在自己領導下的全能政府<sup>⑪</sup>。這是中國大陸能夠在短短幾年內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施行計劃經濟制度的政治基礎。

<sup>⑩</sup>毛澤東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同工商界代表人物的兩次講話，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88～503頁。

<sup>⑪</sup>全能主義（totalism），是已故芝加哥大學和北京大學教授鄒謙提出來的一個概念。見鄒謙